



鹅湖之会——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会（牟宗三）

牟宗三先生

牟宗三先生《鹅湖之会——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大综和与中西传统的融会》

牟宗三 主讲

卢雪昆 访问记录

前言

受《鹅湖》朋友所托，在「当代新儒家国际学术会议」前夕访问老师。因想到老师平常说：「哲学家要为社会指示一个方向。」因此，我想问以下三个问题：

（一）想请老师谈谈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二）最近亚州电视台给老师做了一个专访。电视访问中，老师说：儒家思想是「人生之常、自然之常」。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曾说：「儒家哲学是实践的智慧学，它是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也是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那么，我想请老师谈谈新儒家在现时代中应该有怎样一个担当。

（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陆上要求改革开放，儒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了热门话题。新儒家如何响应这种问题？

牟先生：

你提出三个问题，我不必逐个答复。总起来是一个问题。两年前那次新儒学会议我有一个讲辞，[1] 那篇讲辞是一个反省之语，前一代老先生启发性有余，客观的了解不足，所以不能适应时代之所需。这次换一个话题，就你刚才所提的问题总起来讲两点。

未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大综和时期

新儒家的兴起有历史运会的必然性，因此，它在历史运会中也有它在这个时代中的使命。今天我就告诉你两点。

「七七」事变那一年，中国哲学评论会议在南京召开，其中有沈有鼎先生的一篇文章。念哲学的人当中，沈有鼎是最聪明的一个，他有逻辑的天才，但也有哲学的天才。念哲学的人当中，沈有鼎是最聪明的一个，他有逻辑的天才，但也有哲学的天才。但是他的坚持性、执着性不够。《中庸》说：「择善固执之。」不管你有哪一方面的天才，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成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可以

成逻辑专家，有贡献；假定你有哲学天才，你固执下去，你对中西哲学的最高境界也可以有贡献。可惜他就是持续力、坚持力不够，但他有些识见、洞见力很强。他也不是真正的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详细的深入内部的了解，但他笼统的有一个看法。当时他的文章有一个说法：中国文化在先秦儒家是孔、孟，后来是宋明理学家。将来这个时代，中国历史的运会是一个大综和时期。这个大综和时期一定是继承宋明儒，从宋明儒偏枯的一面再往前推进一步，适应现时代。

我们平常说，宋明儒学特别偏重于内圣。到明朝末年，十六、十七世纪，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出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的运会要开一个新方向，不能再维持宋明儒那六百年的方向，那个方向太重视内圣。所以，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他们就主张从内圣开外王，就是向外开，因此，才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为什么打断了，开不出来了呢？就是满清的关系。满清一到中国来，就是一个异族统治中国，把黄梨洲、王船山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堵住了。大家都知道，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是明朝三大遗老。王船山在衡山猿洞著书，他的书根本不得印行，后来曾国藩才替他印出来。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是多么开明，但满清一来都给堵住了。顾亭林一方倡言亡国、亡天下之不同，一方力主经世致用之学。但因他根本反对满清，所以他的学术思想、文化精神持续不下去。

十七、十八、十九世纪三百年是满清大帝国，满清大帝国对中国文化一点好处也没有，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怎么能出来共产党呢？就是五四运动的浅薄的理智主义。五四运动为什么那么浅薄呢？这就是满清干嘉年间考据学问的遗害，这个学风一步一步影响下来，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丧失思考力，丧失发展思想的能力。满清三百年的统治，知识分子丧失思考力，那个历史运会错过了，那个从内圣开外王的方向、要求堵回去了。假定没有满清三百年统治，中华民族发展的自然方向跟西方差不多。清朝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纪这三百年，而西方正是这三百年蒸蒸日上地向现代化走。这些向外开的思想在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中都有了，都看出来了。中华民族这个文化生命是自然地要往外开，就是让满清人堵回去了。

沈有鼎是念逻辑的，但他喜欢谈大问题、说大话，他有这种聪明。他有哲学天才，我写《易经》那部书，旁的人不能欣赏，就是他能欣赏。他说我那部书是「化腐朽为神奇」。

我们这个朋友有洞见，他当时就说：中华民族文化生命本来就是要求向外开，让满清堵回去了，现在我们碰上中、日战争这个大时代，但将来历史总还是要往前进，日本不能亡中国的。所以，他看到：在历史的运会上，将来的中国一定是一个大综和，这个大综和就是继承宋明儒内圣之教往外开。当时沈有鼎有此一说，只是几句大话而已，没有人理会他。他们也没有这个见识，因为我们对以前内圣之学不清楚，「七七」事变那年我才二十七岁，所以自己不清楚。当时我看了沈有鼎那篇文章，觉得很有道理。但他不能「择善而固执之」，所以也不能把他提出那个大综和的脉络、内部的结构一步一步讲出来。沈有鼎讲不出来，我当时也一样讲不出来，但我那时候就有这个识见，我说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以后就是抗战，上海一撤退，我们就逃难。八年抗战和熊先生在一起，对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与内蕴好好整理，客观了解，了解透彻了，自然就往外开了。

沈有鼎说中国将来是一个大综和，当时大家都不能够很清楚地确定地了解这句话。大综和不是一句大话，说大话是没有用的。综和什么东西呢？如何综和呢？当时我们都不清楚。中国文化有一个文化生命，有一个本，这是不错的，但本是本，要综和些什么东西呢？

这个很难解答。

将来支配中国命运的是彻底的唯心论

今年十月间，济南山东大学举办新儒家会议，傅成纶参加了。傅成纶是抗战时期我在成都教书时的一个老学生。会议结束之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告诉我那个会议的情况。会议里面讲新儒家，这个以前谁敢讲？以前批林批孔呀！山东大学一位教授谈到新儒家三点贡献：第一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这个传统在大陆上已经成「死螃蟹」了，扎死了；第二点，权衡其得失，如何现代化；第三点，如何建立一个中西文化结合的模式。这位教授也谈到新儒家的缺点，就是经世致用的比例不够。他们问就是这个问题：你新儒家究竟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政治家呀！我上哪里经世致用呢？科学不是耍魔术，不是我说要科学，科学就来了。这种问题是大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历史运会的问题。我们从哲学上疏通其通路，这就是新儒家的贡献了。

傅成纶的长信最后提到沈有鼎，沈有鼎这个人很怪，他心中始终存有那一个看法，但他平常不注意这一套，他不念政治哲学，不念历史哲学，也不讲文化问题。傅成纶信中提到：沈有鼎当年在昆明写了一篇文章，文章说：「将来支配中国命运的不是延安的彻底的唯物论，就是此间的彻底的唯心论」「此间」是指广义的自由世界，照中国讲就是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世界。沈有鼎说了这么两句怪话，前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了，当时左倾的意识风靡天下，一般人都往延安跑，左倾的社会风气整个的往一边倒，社会舆论都掏空了。沈有鼎说的「彻底的唯物论」就是共产党那一套，以后它果然成功了，但也不过如此。苏联、东欧都垮掉了，中共能维持多久很难讲，但它早晚非和平演变不可。大陆总要变，总要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走。中共主宰大陆四十多年，主宰的结果是「彻底的唯物论」的彻底失败，没有人相信马克思。

「彻底的唯物论」过去了，那么，「不是延安的彻底唯物论，就是此间彻底的唯心论。」什么叫做「彻底的唯心论」？这个「彻底的唯心论」由谁来表现？沈有鼎的话有一种哲学洞见，这种话只有哲学家可以说出来。「就是此间的彻底的唯心论」这句话跟他在南京讲「大综和」的文章是相呼应的。这个大综和说得更哲学化一点，就是彻底的唯心论，彻底的唯心论就是一个大综和。沈有鼎当年说这句话，现在看来应验了。风气又转过来了。再没有人相信彻底的唯物论，没有人相信马克思了。傅成纶给我的那封信中谈到，山东大学那个新儒学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女副教授提出来：为什么会场上没有人提马列主义？这个在以前是不成的。可见风气变了。没有人提马列主义，马列主义给冷落了。年龄大一点的人要敷衍共产党，拉孔夫子跟马克思合作。没有人相信马列，他们就拉孔夫子，这样一来，孔夫子又倒霉了。你把孔夫子拉去，孔夫子就是彻底唯心主义的一个象征。

这个时候说的彻底唯心论，不是哲学上一个空洞的名词，要彻底好好了解。沈有鼎说彻底唯心论的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到，他怎样个说法，如何论证，我也不清楚。他写这篇文章还是抗战时期，我们还在成都，当时也没有人注意他。可见他写的那篇文章不是很大，或许只是几句话。所以我说沈有鼎这个人顺着自己的洞见「择善而固执之」的坚持力量不够，学力也不够。「彻底的唯心论」只是一句话，这点要充实内部，它是一个大系统、一个大的综和。这个大综和要一步一步撑起来、建构起来，加以展开。这个工作很难，要下工夫。

沈有鼎说：「不是延安的彻底的唯物论，就是此间的彻底的唯心论。」延安的彻底的唯物论表现过了，表现的结果是彻底失败。将来中华民族的方向、历史运会的方向必然是

彻底的唯心论，必然是一个大综和。这就是说，新儒家的兴起有历史运会上的必然性，你要担当这个必然性。中华民族要担当这个必然性。

念兹在兹，默默耕耘

我这个人是个默默耕耘的人，我一生没有作官，我不参加国民党，当然我更不参加共产党。我不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我是这个时代的旁观者。所以我这个生命，你要注意一句话。「旁观者」就是你自己闹中取静，你自己默默地在耕耘。「旁观」就是这个意思。默默耕耘中，我活了八十多岁。要有相当的时间才成呀！没有时间，任何聪明都没有用。

我这个人只能教书，既不能干政治，也不能做生意，抗战时期也没有汗马功劳。所以，对于这个时代，你不是一个参与者。你只能默默地耕耘，就是自己读书，教一辈子书。同时念兹在兹，思考一个问题。思考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的方向，如何从内圣开外王。如何从内圣开外王，就是沈有鼎所说的那个大综和。

这个大综和不是一句空话，假定你从中国文化生命的命脉一步一步的渗透悟入，先了解了自己才成。笼统地说「文化生命」，只是一句话，没有用的。笼统地说「先秦儒家」，也只是一句话，也没有用的。你要一步一步进去，要把握住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的命脉。这要费时间，下苦功，不是一句空话就完了。「孔、孟之教」一句话没有用，要彻底了解什么是孔子的智慧，什么是孟子的智慧。要一步一步契入，这就是荀子说的「真积力久则入」（〈劝学篇〉）。对于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要能契入，一步一步地悟入，你才能够知道这一个生命的命脉为什么能开出一个大综和系统。

一步一步契入文化生命的命脉。先讲先秦，我写了几部书，一部是《历史哲学》，一部是《政道与治道》，从夏、商、周三代一直演变到春秋战国，这样才能够把握先秦时期孔、孟的生命智慧，了解在历史运会中、历史发展中孔孟生命的格范。再往前发展，经过汉朝的经学期，到魏晋时期复兴道家，我又写了《才性与玄理》。写《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都是了解中国的原始文化生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如何发展到春秋战国，以后又如何出现两汉经学，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己一根的发展，发展到东汉末年停止了。西方人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到汉朝就完了，以后就没有了。但是我们不能这样看，我们认为中华民族是大器晚成。

中华民族文化原初那个模型一条根发展到东汉末年停下来了，至魏晋时代是峰回路转，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道家复兴。道家是中国原有的，道家在先秦战国时代已经出来了，但没有起作用，道家真正在时代中发光是魏晋时代。所以，我写《才性与玄理》，展现魏晋玄学系统。通过道家的复兴，接受佛教，下一个阶段是南北朝、隋唐。到南北朝、隋唐的时候，中国文化生命断绝了，那是一个大弯曲，绕个大弯曲子，绕出去了。那个时候是佛教的天下，但是佛教究竟不能治国平天下，虽然到隋唐佛教都吸收进来了，唐太宗打天下还是继承中国老传统文化，只是那个文化精神没有显出来。经过道家的复兴到南北朝、隋唐佛教，我写了《佛性与般若》，彻底了解佛教。佛教以后，下面就是宋明理学。我写了《心体与性体》疏导宋明理学。通过长时期的工作，写出这几部书，契入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命脉的内部，然后把这个生命表现出来。这样表现出来，「文化生命命脉」就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大话，这样才能够讲往外开的问题。我们讲往外开，开什么东西呢？当年黄梨洲、王船山要求从内圣开外王，那是十七、十八世纪。到现代，我们就是要求跟西方文化传统相

结合，要求一个大综和。

以中国文化命脉为本，创建一个大宗和

现在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学传统、自由民主传统。这个大宗和首先要契入中国几千年文化生命命脉的最内部，一步一步地经过了解，储蓄在心中。中国文化生命丰富得很，不是像胡适之先生和共产党那样，「中国在哪里？」懵然不知。不是中国贫乏，是你胡适之先生本人贫乏；不是中国文化生命贫乏，是你们共产党、马列主义邪恶非理性。那么，这个大宗和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文化命脉作本，要求跟西方希腊传统来一个大综和。西方的科学、哲学从希腊开出；近代化的自由民主成分很多，希腊传统有贡献，罗马也有贡献，再加上近代工业革命、英国的大宪章，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是近代的事，就是近三百年的事，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讲西方传统，除了希腊、罗马之外，还有希伯来传统，希伯来传统是宗教（基督教）。这就是西方文化的轮廓。

我们要求一个大综和，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命脉来一个大综和，是要跟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结合，不跟基督教大宗和。跟基督教没有综和问题，那是判教问题。我们不反对基督教，西方人相信祈祷，他们可以用那个方式，我们不用那个方式，但是我们可以判教，跟以前佛教判教一样，可以分别它的同异、高低、圆满不圆满。

所以，这个大宗和一方面要彻底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命脉，要经过这个时代，一步一步要客观了解。不要以为隋唐佛教与治国平天下没关系，便轻视它，隋唐佛教对于开发思想的理境贡献很大。先把自己民族文化生命的命脉弄清楚，然后了解西方的传统，从希腊的科学、哲学传统一直到现在的自由、民主政治。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宗和吗？这个大宗和不是一个大杂烩，不是一个拼盘，它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所以，大宗和要从哲学上讲，它就是一个哲学系统，这个哲学系统就是沈有鼎所说的「彻底的唯心论」。

彻底唯心论系统之建构

什么叫做「彻底的唯心论」呢？用「唯心论」这个名词倒是不错，但是西方哲学里面没有唯心论，西方哲学只是idealism。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无论是柏拉图的idealism或者是康德的idealism，或者是柏克莱的idealism，皆不能视之为唯心论。Idealism不是心，所以西方哲学只有idealism，没有唯心论，一般翻译作「唯心论」这是共党的乱骂人。共党用唯心、唯物是价值的标准，他们那里懂得西方的idealism！idealism是讲idea，但idea本身不是心。照柏拉图那个idealism说，是理型论。照康德讲的transcendental idealism说，是「超越的理念论」。理念是什么？是理性上的概念，在康德idea是理性上的概念，理性上概念不同知性上的概念。从知性上讲的概念是范畴，是成功知识的条件。理性上的概念不能代表知识。所以，在康德，只能称之为transcendental idealism（超越的理念论）。在柏克莱，idea是知觉现象，它不是心，是心的对象、具体现实的对象。柏克莱说：to be is to be perceived（存在即是被知觉）是主观的觉象论。所谓主观的观念论、主观的唯心论，这些译名统统不对的。西方使用idea，都是作对象看，对象跟心有关系，跟认知心有关系，但其本身却不是心。所以，假定说彻底的唯心论，只有中国才有唯心论。

中国有唯心论，没有idealism。中国所说的心，不是idea。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是

心，四端之心是心。陆象山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是宇宙心，其根据在孟子。王阳明讲良知，还是心。佛教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也是心，不是idea。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前一个系统是唯识宗，唯识宗讲阿赖耶，阿赖耶识是识心，也是心，不是idea。所以，只有中国才有真正的唯心哲学。人么叫做彻底的唯心论呢？就是中国唯心哲学这一个大系统。这个大的哲学系统如何撑起来呢？如何凸显出来呢？大综和代表的那个大的哲学系统，内部地讲，就是中国的唯心论系统；外部地讲，就是中西两文化系统结合。

以哲学系统讲，我们最好用康德哲学作桥梁。吸收西方文化以重铸中国哲学，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康德是最好的媒介。康德架构开两个世界——现象界（phenomena）和本体界（noumena），套在佛教的名词上说，就是「一心开二门」。在西方，noumena方面开不好，根据康德系统，noumena是消极意义的。照佛教讲「一心开二门」，一心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开真如门、生灭门。生灭门就是现象界。天台宗所谓「一念三千」，对两门而言，不是有两套三千世间法，只有一套，一转手就是寂灭真如，常乐我净；一转手就是生死流转。三千世间法从哪里来呢？它不是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创造出来的，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不会创造。三千世间法怎么来的呢？从无明来，由无明才变现出这么些东西，把无明拉掉，三千世间法就变成清净功德、变成明。这就是《维摩诘经》所讲的除病不除法。所以佛教讲「一心开二门」。

中国以前佛教讲真如门、生灭门，二门都开得好。先讲生灭门，然后讲真如门。西方康德生灭门开得好，生灭门就是现象界，但真如门开不出来，因为康德说noumena是消极意义的。借用「一心开二门」这句话，应用到康德的哲学，就是phenomena和noumena，这要根据中国，东方儒、释、道三教的命脉、文化精神来了解，根据康德那个系统是不够的。

「一心开二门」要根据中国的传统。所以，我说你要把握中国几千年的活动，要深入文化生命的命脉内部。要彻底浸润，你才能了解它的好处，要不然「文化生命」只是空洞一句话。照胡适之先生，中国文化在哪里呢？他完全不能了解，那么，中华民族几千年不等于在那里睡觉吗？

彻底了解中国的唯心论系统，然后根据这个系统的智慧方向来消化康德。因为康德不能说彻底的唯心论，他只能讲超越的理念论，超越的理念论就含着消极的意思。照康德，积极的是经验的实在论（empirical realism）就是限于现象世界、经验世界。这个问题，请看我的《现象与物自身》。所以，我们根据中国的智慧方向消化康德，把康德所说的超越的理念论与经验实在论那个形态转成两层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和「无执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是识心；「无执的存有论」就是智心，这就是彻底的唯心论。彻底的唯心论就从「无执的存有论」透出来，这个在西方是透不出来的。由无执存有论透出的彻底唯心论，亦称彻底的实在论。因为智心与物如同时呈现，智心是绝对的心，物如是绝对的实在，固同时是彻底的唯心论，同时亦即是彻底的实在论也。阳明说明觉之感应为物，物是无物之物，亦同此解。此种精微之玄理，若不深入其里，那能得知？

表现彻底的唯心论系统，不能依附政党

现时代，我们要求科学、民主政治。表现这个彻底的唯心论的大系统不能希望任何一个政党来领导。政治家管不了那么多，你不能靠他们来做。政治家亦要在我们这个大系统的方向之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大系统是一个哲学问题、文化方向的问题。在中西两个系统的结合之中，我们肯定科学，肯定自由民主，并疏通其哲学理境上可能性。在肯定自由民主这个自由社会里，让我们独立地讲这个思想，永远讲这个思想。只有在自由民

主的社会，我们才可以自由讲学。国民党是政党，他向自由民主走就是好的，就有贡献中国的现代化。不必期望他仍能讲这个大系统。共产党更不行，因为他根本是中西两传统的反动，只有他彻底改革了，开放了，放弃马列邪思，他始能回归于中西两传统。所以，你只能督促他实现自由民主，在自由民主之下，保障你讲学的自由，维护住中西两传统之命脉。

马克思主义已经过去了。大陆上可以讲社会主义，但不是马列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那个社会主义根本是个反动，存心不正。所以，大陆上讲「社会主义」一定要照〈礼运〉篇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讲。照〈礼运〉篇讲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放弃马列主义。因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不承认价值的标准，一切道德价值统统被抹掉。这就是反动，就是量化的精神。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量的社会主义」。照〈礼运〉篇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质的社会主义」。大陆上要实行社会主义，一定要从它那个「量的社会主义」转变成「质的社会主义」。质的社会主义就是孔子作主，不是马克思作主。

最后，我要说：科学、自由民主是理性上的事，是人类理性中所共同固有的。既然是人类理性上的事，怎么说单属于西方呢？！这不是「西化」的问题。中共不许讲「自由民主」，是害怕和平演变。同时，我要说：科学、自由民主不是哲学家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肯定科学、自由民主，自然可以开发出来。这个「大家」，台湾、大陆都包括在内。大陆、台湾都走科学、自由民主的道路，我们不是可以自由讲学了吗？所以，我说，新儒家要在自由民主政治保障下担当历史运会中的那个大综和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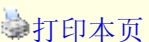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原载《联合报》1992年12月20/21日

取自《牟宗三先生晚期文集》

[1] 濫玉註：當指〈客觀的了解與文化之再造〉

<http://yp719.et.cyu.edu.tw/cgi-bin/topic.cgi?forum=27&topic=593&show=0>

发表日期：2007-7-11 浏览人次：173

版权声明：凡本站文章，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任何网站，媒体如欲转载，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